

“中国
中世纪”
的终结



The End of the
Chinese “Middle Ages”

中唐文学文化论集

Essays in Mid-Tang Literary Culture

Stephen Owen

[美] 宇文所安著

陈引驰 陈磊译 田晓菲校



宇文所安作品系列



中国 “中世纪” 的终结

**The End of the
Chinese “Middle Ages”**

中唐文学文化论集

Essays in Mid-Tang Literary Culture

Stephen Owen

[美] 宇文所安 著

陈引驰 陈磊译 田晓菲校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 / (美) 宇文所安著；陈引驰，陈磊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

(宇文所安作品系列；2966)

ISBN 7-108-02367-9

I. 中... II. ①宇...②陈...③陈...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唐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4200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装帧设计 罗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图 字 01-2005-0812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5.125
字 数 123 千字
印 数 0,001 - 8,000 册
定 价 12.00 元

三联版前言

在本书的标题中，“中世纪”这一称谓是加了引号的。引号的作用是提醒读者：中国的“中世纪”和欧洲意义上的中世纪（the Middle Ages）不同，用“中世纪”来描述中唐可以说是老子所谓的“强名”。

我使用一个欧洲的词语，是为了唤起一种联想：欧洲从中世纪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和中国从唐到宋的转型，其转化有很多相似之处，也存在深刻的差别。对英语读者来说，使用“中世纪”的称谓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我们可以从此开始，讨论八九世纪之交，也就是在唐贞元、元和年间，初次产生的重大变化。

“中世纪”这一称谓对英语读者来说是个有用的切入点，因为它听起来很熟悉；那么，它对中国读者来说也是个有用的切入点，因为它的新奇。书的英文标题有两个“中”字：“中唐”把这一历史时期放在一个在文学和文化史研究中十分熟悉的范畴（也即唐朝）里面；而“中世纪”则要求读者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思考这一历史阶段。当我们改变文学史分期的语境，熟悉的文

本也会带上新的重要性，我们也会注意到我们原本忽视了的东西。

我不是说我们可以任意划分历史阶段；我希望指出的是，存在着不同的方式（同等有效的方式）来理解一个历史时期。用朝代的模式来思考文学和文化史当然是可以的，但这一模式已经成为家常便饭。有时候，我们只能看到博物馆里的雕像的正面；我们可以看很长时间，可以看很多遍，直到我们认为我们已经非常了解这一雕像了。但是，假使我们换一个角度——这一角度可能是很不舒服的，不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所设计和期待的，但是，从这一角度，我们却会看到我们以前从未注意到的因素。我们感到惊异和兴奋。假设在这个时候，一位艺术史家向我们解释说，雕像曾经放置在一座庙宇之内，善男信女们在进入庙宇时只能从某一特定的侧面看到雕像，而不能很容易地看到雕像的正面，这时，我们就会意识到：我们已经看习惯的雕像，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由博物馆陈列展品的惯例所产生的一种特定形象，如此而已。

按照朝代进行分期的文学史，是文学中的博物馆形式。我们已经拜访了很多这样的博物馆，它们是我们整理阅读经验的熟悉模式。这种理解模式并不算坏，但是只有从一个陌生的角度进行观察，我们才能看到新东西。

学者应该大量阅读，然后思考所阅读的材料。这是“学者”最简单的定义。学者和任何读者一样，有对文学作品作出个性化反馈的能力。但是，学者进行评论的权利是通过广泛的阅读和思考赢得的。如果学者发现某种现象很新奇，这位学者必须追根究底，问一个为什么。

中唐总是给我带来惊讶。在中唐之前，当然也有许多新鲜而激动人心的东西，不过，往往要把它们放在一个可以追溯到东汉的传统中进行理解。如果杜甫是个例外的话，那么我们要记得，杜甫也是由于中唐文人对他的欣赏

才获得其重要地位的。中唐的主要文人就宇宙万物、社会、文化等提出问题的频繁度和激切的程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同时，他们也总是游离和游戏于常规的反应和答案。当然，我们总是可以找到一些先例，但是，如果我们按照历史顺序阅读唐代文学，中唐是让人吃惊的。在这一时期，人们和过去的关系改变了；以往通过重复建立权威的文化，现在由一个通过发问建立权威的文化代替了。

比如说中唐的传奇小说《任氏传》，是以一个传统的“狐狸精故事”开头的。这样的故事应该在郑生发现自己迷恋的女子原来是狐狸的时候结束。但是，郑生没有扮演这样的传统角色，相反，他告诉任氏，他不在乎她是异物，还是一如既往地爱她。只有在超越了标准的“狐狸精故事”时，小说才变得真正有意思起来，而我们也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文化世界。

《任氏传》是中唐文化的典型产物。在中唐，有一种智识上的骚动不安，一种人性的骚动不安，人们不再满足于旧有的答案。譬如说韩愈，“文学史博物馆”里的一座典型的“雕像”，当我们从这样一个新的角度看待他，就会发现他不再是儒家价值观念的虔诚代言人，而是一个非常不安于传统的思想家，一个不得其平而鸣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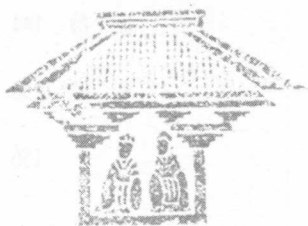
盛唐文学仍然代表了唐代文学的典范，但是我们应该记得，是中唐首次把盛唐变成了这样的典范。中唐以盛唐为基准和思想背景，来理解自己的知性文化。我们不能脱离中唐来孤立地看待盛唐。

这里需要提到，这些文章所没有涉及到的一个方面，是十一世纪后期商业印刷的发展。这是定义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以及衡量中国文学文化之重大转折的另一种方式。这一变化也是在中唐初见端倪的。

最后，我希望在此对三联的冯金红编辑表示谢意，是她不懈的努力使这本书终于和中国读者见面。我也衷心感谢书的译者陈引驰教授和陈磊为翻译这本书付出的大量心血，并感谢田晓菲从她繁忙的工作当中抽出时间对全书进行校对，以保证把原书中有些相当困难的段落清晰地传达给中国读者。

宇文所安

2005年12月



目 录

三联版前言	1
导论	1
特性与独占	11
自然景观的解读	30
诠释	47
机智与私人生活	67
九世纪初期诗歌与写作之观念	87
浪漫传奇	105
《莺莺传》：抵牾的诠释	122
附录	
后园居诗（九首之三）	赵 翼 143

霍小玉传	蒋 防 144
莺莺传	元 稹 150
译后记	156



导 论

这部论文集的问世，已是在我上一部讨论盛唐的唐诗史的写作十五年之后了。在这期间我常被问起是否有意在继《初唐诗》和《盛唐诗》的写作之后，再出一部中唐诗歌史。收在这部集子里的论文，也可以说是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而告之以写作这样一部中唐诗史之不可能性。

这里的论文是具有文学史性质的，然而它们本身却不能构成一部文学史。它们不是要描述一个变化的过程，或是给出一幅大小作家的全景图，而是要透过不同类型的文本和文体来探讨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这些具体的问题就其本身的性质而言与文化史或社会史等更大的领域息息相关。在一个层面上，这里所讨论的文本本身就是文化史的一部分：对于占有或领属权的公开描述，对于微型园林的夸大而富于谐趣的诠释，以及有关男女间风流韵事的讨论，本身就是具有社会性的行为表现，而它们所体现的价值也必定是在某种程度上为传抄这些文本的读者对象所认同的。而在另一个层面上，这些话现象是如何与更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相联结的——如土地所有权的模

式、园林建构及纳妾制度——则不在本论文集的讨论范围之内。

称它作一部“中唐诗史”是不恰当的，因为从791年到825年这一期间的诗歌，较之于初唐和盛唐诗，更难以体裁分类。在风格上，在主题上，以及在处理的范式上，中唐诗远比盛唐诗纷繁复杂，而且其诗歌范围扩大与变化的方式与其他话语形式中发生的变化紧密相关。诗歌、古典传奇及非虚构性的散文享有共通的旨趣，这样的情形在初唐与盛唐则并不如此常见。可能也正是对中唐诗这一侧面的直觉印象才使得自十三世纪以降诸多有影响的批评家指责这一时期的诗歌较之于盛唐诗，少了一份“诗味”。然而中唐诗歌的广度，超越先前诗歌局限的态势，也恰好成为其长处。

现代文学理论在宣称文体的自成系统（每一话语形式都以其专擅而它种形式又不能替代为荣）与宣称某一时期所有文化再现样式都享有共同的历史渊源这两极之间摇摆。前者确信诗歌、小说或戏剧是相当独特的，它主要关注的是拓展其自身的文体潜能，回应其自身的文体发展历史。后者将所有同时代的话语形式都看成是分享着超越了文体形式的某种历史决定因素。^①

文学理论要求我们在这些相互对立的可能性之间做出抉择，或是试图调和它们。这些可供选择的可能性被视作“研究门径”而不是存在于研究对象之中的历史差别。相反，从一种具有历史性的观点我们也许会说：“有时候这一种占上风，有时候则那一种占上风。”在某些时期，纵览全局，呈现出强劲的文体系统；初唐与盛唐便大致是如此，于是在这种情形中“诗歌史”成为可能。然而中唐诗打破了文体的统辖与局限。这样一些深刻地改变了中唐诗

^① 巴赫金有关小说的理论，是形成于有关诗歌特性的类似理论也产生了的这样一个背景，这是前者的很好的一个例证。“新历史主义”以及文化研究中的所谓的新历史转向可以代表后者。



的关注在中唐作品中随处可见，而中唐诗的历史也不再仅仅属于诗歌。

第一篇论文，《独特与独占》，将中唐文学对身份的再现视作对他人或为他人所排斥。在个人身份的层面上，这样的一种特立独行可以表现为宣称自己优于他人，不过它也可以是一种异化感，而这种异化感造成了他人对自己的排斥。在中唐时代的作品中，特立独行表现为一种独特而易于辨识的风格，它可以为他人所袭用，但它却总是与一个个体作家挂钩。在那篇著名的《答李翊书》一文中，韩愈也同样将自己散文的境界趋于精纯的过程归结为摒除属于（或取悦于）他人的杂质。在群体身份的层面上，特立独行也以同样的形式表述出来，比如一个文学集团将自身与大的作家群体区分开来，又比如对韩愈而言，华夏文化的景观取决于对外来成分（佛教）的排除。这一类型的独特性在形式上与一种新的领属权话语相通，也就是说，二者都排斥他人的获得或占有。

接下去的一篇论文，《自然景观的解读》，讨论各种不同的再现风景的方式，显示自然的潜在秩序如何在中唐成为一个问题。一方面是文本对于自然的井然有序的表述和品评；这样的风景具有建筑性，这在先前的诗歌是罕见的。另一方面是对于缺乏潜在秩序的风景的再现，是美丽却不连贯的细节的堆砌。这就引发了柳宗元在一篇著名的散文中所提出来却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否存在一个造物主，在大千世界种种现象的背后，是否存在目的与灵性。

这第二篇论文仅限于物理世界秩序的再现问题，然而同样的问题也在人伦世界的事件中生成。《诠释》这第三篇论文探讨中唐时代的一种倾向，它对现象所给出的推测性解释，要么就是与常识相乖违，要么就对通常认为无需解释的境况做出解释。如此独特的诠释，缺乏任何证据或文本章句的支撑，

常常沾染上一层富于反讽甚或疯狂的意味。这样一来诠释便被看成了一种主观的行为，不是取决于有待诠释的现象，而是取决于诠释者的动机与处境。中唐时代对于这一新的、更具主观性的诠释的自觉意识，可以在白居易作于幼女夭折后自宽自慰的两首诗中窥见一斑：他知道他只是在自宽自解，他作为认识主体为满足其他动机而使用的道理不足以容纳感情现实。

主观诠释行为在纯粹游戏的层面实施时，便成为机智的戏谑。《机智与私人生活》审视对私人空间和闲暇活动的游戏性的夸大诠释，作为抗拒常规价值的一种私人价值观的话语。这样的价值和意义，游戏性地奉献给读者，属于诗人一个人，构成了一个有效的私人界域，迥异于中国道德和社会哲学的专横的一面，这一面甚至将个体的或家庭中的行为都纳入公众价值的一部分。举例来说，当五世纪的一位官吏辞官归田，成为一名隐士栖居在山林间时，这表面上是属于个人的抉择有可能被而且确实通常被理解为一项政治宣言；而当一位中唐诗人戏谑地声称自己在公事之余全身心地为松林或宠鹤所迷时，他那戏谑性的夸示已从公众和政治的意味中摆脱出来。当我们发现这个游戏世界通常和诗人的拥有物相关时，我们并不感到惊讶。这些文本糅合了领属权的问题、主观诠释以及对他人的拒斥，因为他人常规性的观点使她们无法看到诗人所采取的价值观念。

诗人在他的微型园林里上演适意自娱的小戏，在诗中吟咏这样的时光，此刻他已经对有关诗歌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假设做了重大修正：不是诗直接对经验做出回应，而是经验被策划，为了作诗而将空间做了规划经营。《九世纪初期诗歌与写作之观念》探讨中唐时期对写作，尤其是对诗歌写作进行再现时发生的某些根本性的变化。

在八世纪讨论技巧的诗学中我们已经发现了一种论调，承认在诱发诗兴

的经验和诗歌的写作之间有一段间隔。诗歌创作与经验之间的关系被描绘成事情过后的重新回味。到了九世纪初期，原先所设定的诗外的经验与创作间的有机联络已不再是想当然的了。诗的基本材料是对句，被视作“意外的收获”；对句是由深思熟虑的匠心精雕细琢而成，镶嵌入诗。这样的诗歌创作观，不管在西方诗学史的架构中看来是多么的司空见惯，在一个将自然本色奉为圭臬，且原先是靠对经验的敏捷回应（如果不是完全的即兴）来保证的中国诗学系统内，它代表了一个重要的转型。到了九世纪，诗可以被视为某样被构筑出来的东西，而不是一种自然的表达，且诗中所再现的是艺术情境而不是经验世界的情景。这个在骨子里“富于诗意”的情境常被形容为“……外”或“不尽……”——语词或普通人感受到的意象是难以穷尽的。而在一段有关中唐诗人李贺作诗过程的脍炙人口的描绘中，我们又看到诗作为有待锻造和拥有之物，作为想像出来的而又具体可感的构造，毫不逊色于微型园林：每日诗人骑驴而出，靠诗兴灵感偶得一联半句，记下来投入囊中；每晚倾囊而出，将其缀成诗篇。

最后两篇文章探讨八世纪晚期成形的新的浪漫文化。题名《浪漫传奇》的文章以《机智与私人生活》中提出的问题为前提，探讨《霍小玉传》。这篇有关情爱和背叛的故事作为一个例证，显示了私性的价值观是如何试图为这份体验开辟一个空间，使得它免受外界社会的强制。与机智的诗人吟咏他的微型园林有所不同的是，定情不是纯粹的游戏；它的私性疆域难免会和社会之间产生抵牾，受到社会的干扰。然而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观众的存在，他们观摩、评判并最终介入显然是属于私生活的情爱故事。最终浪漫文化不是属于情人，而是属于阅读这些故事的社群，而且在他们当中得到文字表现。在浪漫故事中，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社群，虽说这一社群明显是属于于

公众社会价值世界的人们所组成，却支持浪漫爱情的私性价值。

《莺莺传：抵牾的诠释》探讨的对象是所有唐传奇中最著名的一篇。女主角莺莺和她的情人张生是姻戚，本可以明媒正娶，却卷入了中唐时期炽烈而犯禁的浪漫文化，其结局正如大多数浪漫故事那样，以莺莺遭张生遗弃而告终。男女情人都是一名诠释者，试图将叙说的故事遵循他或她自己的意向来引导，且每一位都要求观众站在对他或她有利的立场上来评判。可是两位情人对于事件的诠释相互抵消，于是我们所面对的是唐代叙事文中这样一幅独特的情景，其中公众的评判成为夙求的对象，然而却又没有固定的评判。情爱故事又再度纳入社群的框架中，社群制造流言，就这段风流韵事创作诗篇，并忖度该如何评判张生的行为。

中唐既是中国文学中一个独一无二的时刻，又是一个新开端。自宋以降所滋生出来的诸多现象，都是在中唐崭露头角的。在许多方面，中唐作家在精神志趣上接近两百年后的宋代大思想家，而不是仅数十年前的盛唐诗人。以特立独行的诠释而自恃，而非对于传统知识的重述，贯穿于此后的思想文化。^① 对于壶中天地和小型私家空间的迷恋而做机智戏谑的诠释，成了在宋代定形的以闲暇为特征的私人文化复合体的基础。^② 浪漫文化不但继续流传，而且唐代浪漫爱情故事不断地被复述和扩充，而后代的作家还在试图处理浪漫文化所提出来的问题。当宋代大作家苏轼观赏一幅美丽的风景画时，他的反应不是寻访该地实景去直接体验一番；在《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

① 对经典诠释的机械重复仍然是传统的组成部分，然而它不再像产生新诠释那样受到重视。

② 这里“私人文化”不是说它仅属于个人。如若不是与一群知音朋友共享的话，那它便通过出版来寻求知音的赏识。不过，这一活动的领域，非不同于国家政体对个人的要求，也和家庭对个人的现实主义要求背道而驰。



嶂图》一诗中，具有审美意味的田园牧歌变成了想像中的购买：

不知人间何处有此境，径欲往买二顷田。

作家以大小巨细各种方式宣称他们对一系列对象和活动的领属权：我的田地，我的风格，我的诠释，我的园林，我所钟爱的情人。

像中唐这样的时代应当有确切系年的界定。这里的论文所集中讨论的大多是 791 年至 825 年间的作品，尽管也有先前和此后的作品收罗在内的。我们知道时代实际上是没有清晰边线的模糊中心，然而我们要划定疆界，要排拒不受保护的空间这样一种地缘习性，本能性地转化为我们为历史绘制的地缘图。要讲述好一个历史“故事”，我们至少需要一个开端。

任何有关中唐的描述都追溯到韩愈这位讲故事的能手，他的文学和文化史叙述造就了所有后来的叙述。^① 韩愈最著名的文化史叙述集中在韩愈自己身上，作为儒学复兴运动的前锋，他的致力于道德的文章，即“古文”，旨在成为承担儒学价值复兴的载体。为了在一个关于“开端”的叙事里给韩愈的叙述定位，就让我们把中唐确定为从 791—792 年开始，在此期间韩愈、孟郊、李观及其他一些书生汇聚在长安，赶赴进士考试。韩愈和李观 792 年进士及第。另外两位重要的中唐作家，柳宗元和刘禹锡于翌年及第。

如若我们将此视作中唐的“开端”的话，这并非出于对韩愈的权威性的

^① “中唐”作为一个文学批评术语，始于明初，最初是用来指始于安禄山叛乱（八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或杜甫之死（770 年）的诗歌史；也就是说，“中唐”的开端在何处取决于文学史家如何来结束“盛唐”。然而树立起以李白和杜甫为核心的盛唐诗的形象，则要归功于韩愈及其他中唐作家的创造。

过分尊重，而是鉴于他对于一个重要文化时刻的卓绝的策划最终成为促成变革的强劲的原动力。我说“最终”是因为，即便韩愈有再大的雄心，他也无从知道他自己会是一个叫作什么“中唐”的开端，或这一事件意味着什么。开端只有在事后的反省当中才会呈现出它的全部意义；你首先必须知道所开始的究竟是什么。尽管年龄差异悬殊——孟郊生于751年，李贺生于790年——然而此后三十五年文人社团的形成，构成了非常独特的一代，这在此前三十五年的作家群中是看不到的。

中唐文学所显示的深刻变化和韩愈对历史延续性的重大扬弃同时发生：韩愈声称他自己和他那个时代是华夏文化的转折点，跨越上千年直接赓续自孟子以降便已废弛的儒学传统。^① 不管这一声称在儒学史上有多么重要，这样一种自封的与往昔的关系在形式上体现了与众多传统的新关系。对属于变化创新的一代人的自觉意识，带来了各式各样的新变和新兴趣，已不是振兴儒学文化的初衷所能够包罗的了。

在七世纪九十年代初会集长安的年轻人，表达了紧迫感和危机感，主张必须做出一番事业来振兴文学，并通过振兴文学来复兴文化价值。这些书生慷慨地赞颂彼此的作品，并深信他们能为千疮百孔的苍茫大地找到良方。韩愈、孟郊及李观的复古主题和道德紧迫感并不代表整个中唐；事实上他们只是复杂整体的一小部分。他们的意义似乎正在于打造一代新人、宣告变革和划分历史时代这一行为本身。

许多人试图说明是政治和社会环境的独特性导致了这些作家的紧迫意

^① 显然，与之遥相呼应的是欧洲史上的宗教改革运动，改革者声称跨越了千年相延的天主教传统，重拾并赓续早期教会的“真正的”基督教。